

蔗糖經濟與城市發展：以四川內江爲 中心的研究（1860-1949）

陳 祥 雲

摘 要

農業的變遷影響人類聚落的發展，城市發展與其產業活動的變化亦有著密切關連。四川盆地於清中葉以後，甘蔗作物成為重要的商品作物之一；清末民初種蔗面積更達70萬畝，產量年約300萬擔左右，產糖量高居全國首位。由於甘蔗的密集生產，因此刺激了手工業的興起，沱江流域成為四川首要的蔗糖經濟區，植蔗面積占全川比率的73%。內江、富順、簡陽、資陽、金堂、資中球溪河等地因此成為糖業重鎮；其中內江專業蔗農高達50%，糖坊、漏棚規模居全川之首，糖商群集，糖號林立，為沱江流域最大的糖品集散市場，內江因此被譽為「甜城」。是以甘蔗成為內江（沱江流域）農民最主要的經濟作物，蔗糖經濟對於清末民初內江城市發展的影響至為深遠。

本文主要探討沱江流域糖業與內江城市的發展，分別就內江蔗糖經濟的形成、城市產業結構的變化，即城市的工業化與商業化；觀察內江蔗糖經濟的形成，對於城市內部社會變遷的影響（包括社會結構、城鄉居民生活、社會衝突等），藉以瞭解區域產業經濟與城市發展的關連，同時提供學者對於近代中國城市類型與發展模式研究時不同面向的思考。

關鍵詞：甘蔗、城市發展、沱江流域、內江

Sugar Economy and Urban Development : Nei-chiang(1860-1949)

Chen Hsiang-yun

Abstract

Agricultural change always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From the middle period of Ch'ing Dynas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e of Szechwan. In T'o River, The most outstanding phenomenon wa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sugarcan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rea of sugarcane amounted approximately to 700,000 mou, and the output of sugarcane amounted approximately to three million picul. Because of the production of sugarcane, which motivated the rise of family handicraft, T'o River Valley became the sugar-producing area, for example, Nei-chiang, Fu-shun, Chien-yang, Tzu-yang, Kin-tang, and Tzu-chung. Sugarcan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ubsistent-crop in these cities, particularly, the city of Nei-chiang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ugarcane market in the T'o River.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sugarcane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in T'o River of Szechwan. First, the study focus on Nei-chiang, it will be help to realiz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and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sugar trad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ulture of the city. In addition to provide a more objective background about the pattern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first section shows that Nei-chiang became the sugar-producing area in T'o River Valley. The second section shows that the rapid expansion of sugar economy. about the rise of family handicraft, the specialization of standard market, the trade of sugar between Szechwan Basin and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The third section discusses the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bout the structure of society, the conflict of society and the local culture. Final section discusses about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onflict by focusing on the events of sugar-peasants in the 1940's.

Keywords : Sugarcane , Urban Development , T'o River , Nei - chiang

蔗糖經濟與城市發展：以四川內江爲 中心的研究（1860-1949）^{*}

陳祥雲^{**}

壹、前言

清末民初內江蔗糖經濟的發展，刺激了手工業的興起，同時也促進了城市的商業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以及城鄉社會的互動，則為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指標。近年學者關於城市的工業化與農村經濟關連的討論仍有相當大的分歧，如黃宗智對於長江下游的研究發現，城市的工業化對鄰近農村並沒有很大的影響；然而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則假設城鄉之間有著平穩的聯繫，中國城市的進步也能引起農村的進步，¹基此不同論調，吾人則希望藉著長江上游區域城市經濟發展的觀察，進一步假設並驗證城市工業化與農村發展的聯繫與互動。

內江處成、渝兩大都會之中心，居沱江之濱，為水陸通衢，人口稠密；而產糖之巨，尤為商業繁榮之所繫。是以內江城市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除了地理與交通因素外，其城市的商業機能擴大，自與沱江流域蔗糖經濟的發達有著密切的關連。內江糖業與市鎮體系緊密相扣，一般糖戶寓商於農，形成耕稼與製糖營業互繫互生的產業結構。整個沱江流域場市發達，糖市林立，如內江的茂市鎮、資中的球溪河、資陽的王二溪、簡陽的石橋、金堂的趙家渡、富順的牛佛渡等皆頗負盛名；其中球溪河更是紅糖專業市場。

本文主要利用四川省檔案館、內江市檔案館所藏內江地區糖業檔案，探討沱江流域糖業與內江城市的發展。分別就內江蔗糖經濟的形成、城市產業結構的變化，即城市的工業化與商業化；觀察內江蔗糖經濟形成後，蔗糖經濟對於城市發展的影響，包括內江城市化的過程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C89-2411-H-130-006之部分研究成果

^{**}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¹ 參見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3-14；王國斌，〈西方學界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趨勢〉，《國史館館刊》，復刊20期（民國85年6月），頁10。

、城市內部的社會結構變遷，如城居人口的變化、社會衝突與蔗農事件等，進一步重建長江上游區域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的歷程及其困境。

貳、蔗糖經濟的形成

四川盆地屬溫帶蔗區，植蔗歷史悠久，至遲漢代已見種植；唐宋時期遂州、資州等地種植普遍，元明以後四川糖業式微，至清初閩粵移民入川，甘蔗種植復盛，植蔗區域亦漸南移。²清中葉以後甘蔗擴種迅速，其中沱江流域即因蔗業的經營與糖品生產，形成頗具規模的甘蔗經濟區。此種經濟作物的專業生產與手工業的結合，改變了傳統農業生產的結構。觀察沱江流域的甘蔗專業栽培深具意義的是，清末民初四川糖業盛極一時，種蔗面積達60-70萬畝，蔗產年約300萬擔左右，糖產量約佔全國總產量的1/2，高居全國首位。³1919年四川一省產糖占全國糖產量的67%；其後產糖雖減，1937年時四川產量仍佔全國的44%左右。抗戰期間，中國沿海產糖省區多為日本侵佔，四川糖的地位更顯重要。⁴

四川沱江流域的農業生態環境，因沿岸地區溫度、雨量相對較低；且生長期短，僅七至八個月而已。就緯度與氣溫而言，內江地居北緯30°左右，緯度稍高，而年均溫在18.3℃左右，氣溫偏低；降水量年平均雖在1,100mm以上，但一般為春乾秋雨，對甘蔗的生長發育稍有影響。⁵其次就土壤條件來說，沱江流域蔗土，分山土與壩土，一般植蔗多利用山坡傾斜地，

² 郭聲波，《四川歷史農業地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91-193；藍勇，《歷史時期西南經濟開發與生態變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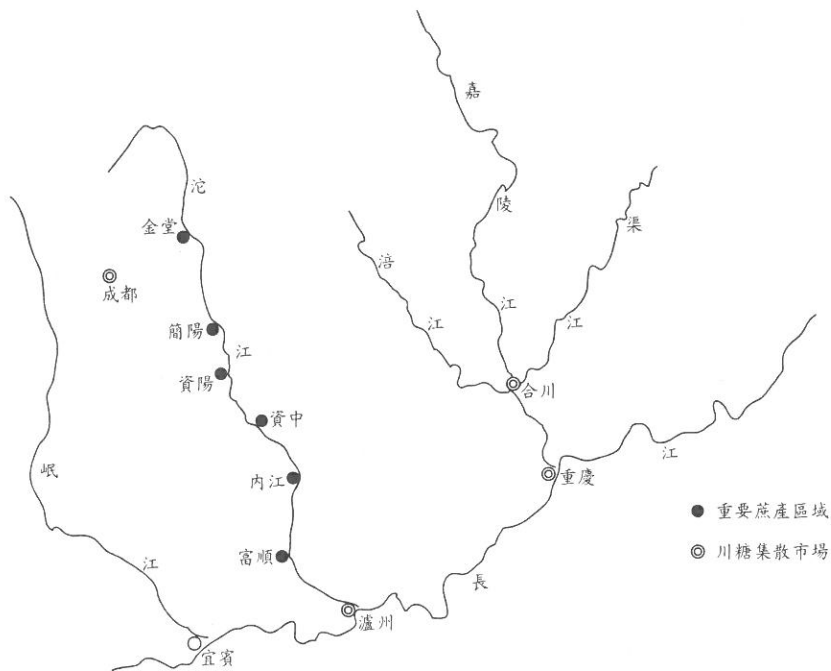
³ 清末川省年產糖約在四千萬斤左右，見周詢，《蜀海叢談》（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5年），卷一，頁25；宣統年間全川糖產量約佔全國產量66%（不包括臺灣在內），見陳家澤，〈清末四川區域市場研究（1891-1911）〉，收於彭澤益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頁319；另見隗瀛濤主編，《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年），頁41。

⁴ 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內江：內江地區檔案館，1984年），內江蔗糖業發展簡況（以下稱簡況），頁3-4；此處1919年四川產糖占全國產量比率，係據日人河野信治調查各省產糖所換算，頁2所載75%有誤，筆者據各省產量換算四川（產糖30,000,000斤）占全國比率應為67%。

⁵ 四川省甘蔗試驗場編，《沱江流域蔗糖業調查報告》，第2章1-2；近代內江水旱災影響農作物生長漸趨嚴重，1860-1930年間內江僅1873、1888、1898、1917、1926年有水災紀錄，1884、1901年出現旱災記錄；民國時期1931-1949年間水旱災頻仍，不到20年間，水災計11次、旱災6次，往往水災後又逢旱災，甚至年內水旱災並至；見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內江市檔案館，1989年）上冊，內江自然災害大事年表。

平地壩土次之。山土所產甘蔗的含糖量高於壩土，資中、內江一帶，山土均佔2/3；⁶山土排水便利，土壤帶棕紅色，為黏性壤土。壩土為河邊淤積地，土質較粗且少肥，但無缺水之虞，所產蔗汁較稀。簡陽、瀘州等縣，平地壩土多為灰棕色之砂質壤土或沖積土，簡陽、金堂一帶壩土，種蔗者甚多；至於資、內一帶壩土，或種蔬菜或種甘蔗。據蔗農的經驗，山土蔗少糖多，壩土則蔗多糖少，⁷所以沱江流域山蔗價格往往高於壩蔗。整體而言，四川沱江流域氣候與土壤雖不如熱帶地區為佳，仍適於甘蔗的生長。主要產蔗縣分首推內江、資中、簡陽、金堂以及富順一帶。1940年代初期沱江流域植蔗面積幾佔全川的76%，產量約為全川糖產量的70%；其中又以內江產量居首，為四川糖業中心。⁸

圖一 四川沱江流域產蔗區域圖



⁶ 趙永餘，〈內江之糖業〉，《四川月報》，11卷2期（重慶：中國銀行，民國26年8月），頁37。

⁷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2：民國23年12月，重慶中國銀行文，民國27年8月，四川省甘蔗試驗場文；另見楊永奎等，〈內江簡陽甘蔗及糖業調查〉，《四川月報》，8卷4期（民國25年4月），頁3。

⁸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3；民國31年2月15日，李爾康、張力田文；另參見游時敏，《四川近代貿易史料》（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72。關於四川糖產量，據張肖梅編，《四川經濟參考資料》（上海：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民國28年），N16所引：1938年前後，全國糖產約200萬擔，其中川省產糖80萬擔，廣東60萬擔，福建30萬擔，其他地區約30萬擔。

近代沱江流域甘蔗的種植，可溯至清康熙年間閩粵移民將蔗種傳入內江地區。⁹內江引種甘蔗後，由於種蔗收益高於其他作物，且部分地區因土地貧瘠，糧食作物生產不豐，於是改種甘蔗的農民漸多，迅而擴及整個沱江流域。¹⁰如道光年間內江「沿江左右，自西而東，尤以藝蔗為務，平日眾夫力作，家輒數十百人」，¹¹此外，簡州沿河之民，亦多有植蔗製糖致富者。大抵說來，清末資州、簡州皆出現了甘蔗的集約生產，如光緒時「資州、瀘州一帶，蔗林翳郁，沿山皆是」。¹²清末政府推廣蔗業，四川糖務總局成立四川糖務講習所，鼓勵農民植蔗，成效顯著，足見「資、內、金、簡之地，非有官府提倡，今何糖房之密也」，¹³清末民初蔗業發展的結果，僅資州的內江一地，種蔗面積約20萬畝，年產蔗達89萬擔。且資陽縣於咸豐時始擴種甘蔗，清末民初已成為四川重要產糖區，年產糖約30萬擔。¹⁴

民初由於軍閥防區制的形成，苛捐雜稅對於甘蔗的種植以及糖品貿易都造成相當的衝擊；加以1920年代後期由於洋糖進口，沱江一帶甘蔗種植面積銳減。1936年沱江流域各縣，甘蔗種植面積僅有197,792市畝。內江一地甘蔗種植面積於1935年減為115,300市畝，1936年更減至93,750市畝。1937年雖回增至111,040市畝，亦不過相當於1911年種植面積的50%；同年甘蔗總產量5.55億斤，亦僅相當於1911年產量的50%弱。¹⁵為圖糖業發展，1936年4月28日成立內江甘蔗試驗場，由四川省政府建設廳與四川大學農學院合組於內江縣城外西聖水寺，目的在增加甘蔗產量，改進蔗糖品質，擴充酒精原料。¹⁶

抗戰期間糖業變化頗大，內江糖業受戰事影響，糖價初跌後漲，1937年9月糖價跌落時

⁹ 關於四川明清以後甘蔗的種植，據內江一帶的傳說，有謂清康熙10年(1671)福建汀州府商人曾達一至四川販賣珠寶，發現內江氣候與家鄉略同，於是動了種甘蔗的念頭。經商數年，積蓄資財後，便回家接家眷及兄弟數人，在內江縣龍門鄉梁家壩定居下來，並開始種植甘蔗的說法。不過此說遭鄒作聖、曾翥的質疑（見〈內江甘蔗引種問題〉，《內江市文史資料選輯》，第2、3期（總第17、18期，1984年），經鄒文的考證，曾達一傳蔗種入川的時間應為康熙55年（1716），而非康熙10年。

¹⁰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簡況，頁4。

¹¹ 王果纂修，《內江縣志要》（道光25年刊本），卷一，土地物產；另見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48。

¹² 光緒31年商部代奏四川廣興實業折；見魯子健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冊，頁667。

¹³ 四川大學歷史系藏，巴縣檔案抄本，宣財一，作物1-3。

¹⁴ 隗瀛濤編，《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頁40-41。

¹⁵ 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製糖工業〉（四川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2年），頁28-29；另參見《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簡況，頁8。

¹⁶ 〈省府在內江設甘蔗試驗場〉，《四川月報》，8卷5期（重慶：中國銀行，民國25年5月），頁129。

，進貨糖商大多虧折，如鄧都幫糖號利豐因此倒閉。¹⁷其中1940年前後急遽的轉變，尤值得注意。同年內江種植甘蔗面積，由抗戰初期的111,040市畝，恢復到125,000市畝；蔗產量達8,765,000市擔，糖產量也增加到74,868,750市斤。¹⁸唯同年5月沙市、宜昌相繼失守後，川糖外銷困難，糖價大跌，以致蔗產銳減。¹⁹1939年內江蔗產量412,500,000市斤，1940年蔗產量增為831,875,000市斤，1941年蔗產量減為529,825,000市斤。這期間內江蔗產量約占同期全川的26-27%，占全國的11%左右。²⁰探究其因，主要是內江蔗農自1940年糧價暴漲後，因種植甘蔗不如糧食有利，於是一般蔗農相繼改種雜糧，蔗田面積遂形減少。其次1942年復因食糖專賣，一般糖房漏棚，不預出資訂購甘蔗，於是蔗農不得不減少甘蔗栽培，當年種植面積即較1941年約減少50%左右。²¹其後內江蔗糖生產逐年下降，1946年甘蔗種植面積減少為61,500市畝，僅是1911年的27.7%；甘蔗總產量只有2.69億斤，相較1911年減少77.5%。²²抗戰期間四川蔗業，相較於清末民初雖形消退；唯因沿海糖產減少，後方各省依賴川糖尤深，川糖仍具舉足輕重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的禁煙刺激了蔗業的發展，而民初內江糖業的發展，則與洋紗入銷內江的貿易結構互有關連。由於外地商人銷紗入川後，所得現金匯出川省，往往出現折損。因此，外商多購內江糖品販售下江，此種貿易事實上促進了內江糖業的發展。此外，糖業與生絲出口貿易的興衰亦有關連。在蠶絲業發達時期，川北與川東南一帶的養蠶農家，因通夜工作容易疲倦，多吃糖藉以提神，故每年消耗糖數不少。惜自1930年代蠶絲業衰敗，糖銷量頓形減少。²³至於1940年代以後甘蔗減種的原因，則多受抗戰時期糧價高漲，糖價低落，以及食糖專賣政策影響所致。是時政府為確保糧食來源，鼓勵糧食增產，資中、內江等甘蔗產區規定1/3蔗田必須改種糧食作物。²⁴

沱江流域農業生態不適於稻作，而甘蔗復能滿足農民對於現金的追求，是以清中葉以後旋即擴種於沿河地區，尤以沱江兩岸的內江、資中、簡陽、富順、資陽、金堂及瀘縣生產最

¹⁷ 〈川糖先跌後漲〉，《四川月報》，11卷3期（重慶：中國銀行，民國26年9月），頁126。

¹⁸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簡況，頁10-11。

¹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3。

²⁰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民國32年6月25日，內江甘蔗改良場業務股函。

²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52；民國31年，凌國清、唐夙良調查報告。

²²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簡況，頁12-13。

²³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15。

²⁴ 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製糖工業〉，頁63。

盛。沱江流域各縣，大都位於盆地丘陵地區，山多田少，米麥糧食作物的產量較低，且其土質較適於種植甘蔗；因此，一般農民無不將甘蔗視為主要生產作物之一。²⁵更以甘蔗的擴大種植與集約生產，沱江流域成為甘蔗栽培的專作區。據1911年的統計，內江的甘蔗種植面積達222,000市畝，總產量達119,800萬斤，甘蔗種植面積占全縣土地總面積的50%左右。而資中、簡陽和資陽等地在沱江西岸30華里以內的地區，甘蔗種植面積更高達土地總面積的70-80%。²⁶另據1939-1940年間的調查，四川植蔗面積約60萬畝，而沱江流域植蔗面積達44萬畝，在全川植蔗面積的73%，²⁷甘蔗產量約達360萬市擔，占川省產量的75%，²⁸足見沱江流域植蔗比率之高及其規模之大。

從沱江流域蔗區蔗農人口和甘蔗種植比率的觀察，不難發現其生產規模的專業化。內江與資中兩地的蔗農人口比較，詳如表一。

表一 內江、資中蔗農比率表（1930年代後期）

（單位：人）

項 別	內 江	資 中
人口總數	598,677	769,130
農民總數	432,411	646,000
農民所占百分比	73%	84%
蔗農總數	216,205	450,000
全農中蔗農所占比率	50%	68%

資料來源：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出版資料不詳），頁327。

²⁵ 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7年），頁823；沱江流域甘蔗種植一般採作方式。此外，不難發現蔗農於蔗田間加種玉蜀黍等雜糧，或種小春作物以致土地不能冬閒；有些農更因「長項」（蔗農預賣甘蔗，若遇收成時產量不足，則需以次年甘蔗償還，並且附加高額利息謂之長項）的緣故，被迫連年種蔗，地力無法以輪作方式調節改善。由於內江蔗農90%以上預賣甘蔗即賣青山，因此一般蔗農重蔗產量而不重含糖量，所以蔗農往往於甘蔗畦中種植豌豆、蠶豆、甚至麥等作物，以資調節糧食需要。尤其青山價格隨糖價增高時，甘蔗種植面積則隨之增加，糧食面積相對減少；至於資中、資陽地區多係賣預糖，故重糖量，間作的情形較少，參見《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1-62；民國29年，四川省甘蔗試驗場穆華金文。

²⁶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簡況，頁6。

²⁷ 鍾崇敏，《四川蔗糖產銷調查》（重慶：民國30年），頁18-21。

²⁸ 周開慶，《四川經濟志》（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頁32。

由表一可知，內江農民中有50%為專業蔗農，而資中蔗農比例更高達68%左右；此外資陽蔗農亦占全縣人口60%以上，²⁹可見一般。另據方濱生的調查，水糖區各縣（包括金堂、簡陽、資陽、球溪河）平均植蔗面積占耕作面積的58%，其中資陽縣更高，所佔比率達69%。至於白糖區各縣（包括資中、內江、富順）平均植蔗面積占耕作面積的51%。而整個沱江流域包括簡陽、資陽、金堂、資中、內江、富順、瀘州等七縣，糖產約占全川糖產76%，農民咸賴甘蔗維生，³⁰由此可以想見沱江流域甘蔗種植的密集和蔗園的規模。又據1938年四川甘蔗試驗場的調查，各縣甘蔗栽培面積，如表二所列：

表二 沱江流域農家甘蔗種植面積（1938年）

縣 名	每農家平均作物面積 （畝）	每農家平均種蔗面積 （畝）	種蔗面積所佔百分率 （%）
金 堂	39.20	17.03	43.44
簡 陽	48.20	29.01	60.20
資 陽	37.64	16.18	43.00
資 中	35.22	12.55	35.63
內 江	43.30	24.90	57.50
富 順	44.03	20.90	47.47
平 均	41.27	19.76	47.87

資料來源：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73。

沱江流域七縣平均種蔗面積比例為47.87%，約佔五成左右。其中簡陽種蔗面積比例達60.2%最高，其次內江達57.5%，資中種蔗面積所佔比例較低，僅35.63%。各縣甘蔗種植面積與甘蔗產量的情形，據1940年間的統計，大致說來，內江均高於資中、資陽等地。內江蔗田面積為166,375畝，資中蔗田面積為140,388畝，³¹資陽蔗田面積為48,000餘畝。至於甘蔗產量

²⁹ 〈資陽糖業概況〉，《四川月報》，5卷6期（民國23年12月），頁82。

³⁰ 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出版資料不詳，臺北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藏），頁328；另見《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73-174，民國27年8月四川省甘蔗試驗場文。

³¹ 資中蔗田面積以石計算，每2石5斗約等於一畝；與內江以每萬土（約合2畝）計算不同。

亦以內江的582萬餘擔較高，資中蔗產量達491萬餘擔，資陽蔗產量則僅有168萬餘公擔；³² 35-1940年間內江蔗田面積及甘蔗產量變化，詳如表三：

表三 內江蔗田面積及甘蔗產量（1935-1940年）

年 別	蔗 田 面 積 (畝)	甘 蔗 產 量 (公 擔)	備 考
1935年	153,732	5,380,570	按實際稅收估計
1936年	125,000	4,375,000	按額定稅收估計
1937年	79,486	2,782,000	按實際稅收估計
1938年	135,000	3,375,000	
1939年	137,500	2,750,000	
1940年	166,375	5,823,000	

資料來源：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89。

說 明：1938年以後蔗田面積為實際調查得來，產量係根據蔗田面積推算。

叁、內江產業結構的變化

內江的產業結構，因蔗糖經濟發達，由農業發展出農工結合的手工業，且糖品貿易的大進而又刺激了商業的發展；底下茲就產業結構的變化，觀察此一沱江流域專業糖市產業結構變化的特徵。

一、從糖坊到漏棚

甘蔗經濟區的形成，不僅擴大了內江地區甘蔗的種植，成為甘蔗集約生產區域，同時刺激了縣內製糖手工坊的興起，成為沱江流域製糖工業中心。內江糖房、漏棚的規模居全

³²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89、頁91、頁92。

之首，昔人所謂沱江沿岸「五里糖房，十里漏棚」的景象；多少反映了沱江流域糖業發達的事實。清末民初四川的製糖手工坊多集中於沱江流域甘蔗專作區內，沱江沿岸產糖州縣糖坊林立，其中製糖較盛州縣，如簡州有製糖戶359家，內江有製糖戶788家，而資州製糖戶數更高達1,059家。據1910年的統計，川省製糖戶數計達8,937家，則沱江流域製糖戶幾占川省的24%。³³且清末民初僅內江產糖，每年糖清產量達一億斤以上，其中白糖達2,400萬斤，桔糖3,600萬斤，水糖2,500萬斤，冰糖400萬斤，對於全川糖品生產，可說是舉足輕重。當時內江一地糖業盛極一時，糖房多達1,200家，漏棚1,000家，冰鋪160家。³⁴抗戰期間隨糖業的興衰，糖房漏棚數量時有變化，然內江糖房大致維持在六至八百家左右，漏棚少時約有二百餘家，多時達七百餘家；至於冰鋪大約在七、八十戶左右。³⁵1942年的統計，內江糖房數僅105家、漏棚數僅47家、糖房兼漏棚數548家、冰鋪僅17家，另有糖廠4家；相較於民國初年糖房漏棚數量減少甚多。³⁶整個沱江流域各縣糖房漏棚數量變化，據1935年的統計，內江糖房戶數達773家，至於資中糖房戶數620家，簡陽糖房戶數445家，資陽糖房戶數264家，威遠糖房戶數僅有70家。至於漏棚戶數，內江有773家，資中有272家，資陽則僅有3家；³⁷1940年時漏棚戶數，內江略減為732家，資中則增為475家，簡陽有287家，資陽有5家。³⁸1941年糖坊的調查，資中縣屬球溪河以上，資陽、簡陽、金堂一帶紅糖產區，糖房戶數約有1,500餘家，漏棚戶數則僅200餘家。球溪河以下資中、內江、富順一帶白糖產區，糖房與漏棚戶數各約有1,500餘家左右，其他紅糖產區，則只有糖房而無漏棚。至於冰糖鋪則聚集於內江，約有40餘家，其他各縣雖有，但為數甚少。³⁹抗戰期間四川製糖業的發展，內江、資中兩地相繼出現機械製糖工廠，不過沱江流域的製糖戶數，仍以簡陽、資中、內江三地較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簡陽製糖戶數增加迅速。⁴⁰另據1945年的統計，沱江流域各縣糖房漏棚數量仍以內江一

³³ 《四川第四次勸業統計表》（1910年）；引自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頁303。

³⁴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805。

³⁵ 黃江陵，〈解放前內江的糖業貿易〉，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1992年），頁127。

³⁶ 見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31。

³⁷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29；另據張肖梅編，《四川經濟參考資料》，頁R89對於內江漏棚數的統計：1935年為783戶，不過相較於1933年的統計793戶，已略顯減少。

³⁸ 內江地區檔案館主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16-417。

³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41。

⁴⁰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31。

地最多，其中內江糖房數量有769戶，資中則有530戶；而漏棚數量內江有725戶，資中次之，尚有350戶，資陽最少僅有5戶而已；至於糖房兼漏棚者，資中有125戶，簡陽亦有114戶。⁴¹由此可見1930年以後內江糖手工坊的衰退，製糖遠不及民初。1935-1945年間沱江流域糖坊漏棚數量變化，詳如表四。

表四 沱江流域糖坊漏棚數量變化（1935-1945年）

年 份	沱 江 流 域				內 江		
	糖戶總數	糖 坊	漏 棚	糖坊兼漏棚	糖戶總數	糖 坊	漏 棚
1935	3,220	2,172	1,048		1,546	773	773
1940	4,102	2,603	1,499		1,547	815	732
1945	4,026	2,534	1,253	239	1,494	769	725

資料來源：據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12、416、429、431、434統計製表。

至於內江糖坊的區域分佈，縣內糖房多集中於茂市鎮、東興鎮以及裨木鎮；此與沿江水運便利，利於糖品貿易有關。糖房分佈情形，如表五。

表五 內江糖房分佈及數量表（1934年）

區 域	鄉 鎮	數 量
西 區	茂 市 鎮	122
	張 家 鄉	37
	西 附 城 鄉	29
	靖 民 鄉	27
	安 全 鄉	24

⁴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34；民國34年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甘蔗改良場的調查。

東區	龔家鄉	21
	凌家鄉	19
	萬家鄉	11
	東興鎮	77
	松柏鄉	47
	田家鄉	20
	觀音鄉	15
	永興鄉	11
	同福鄉	11
	石子鄉	7
	復興鄉	2
	楊家鄉	1
	樺木鎮	82
南區	郭家鄉	51
	龍門鄉	34
	伏龍鄉	12
	史家鄉	45
北區	便民鄉	42
	富溪鄉	23
	賈家鄉	11
	來鳳鄉	10
	新店鄉	3
小計		794

資料來源：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06。

圖二 內江地區糖房主要分佈區域圖



1941-1942年間內江糖房銳減，糖房兼漏棚家數較多；1941年內江糖房漏棚統計，糖房家數140，漏棚家數670，1942年內江糖房兼漏棚家數552，糖廠家數3，1943年糖房兼漏棚家數427，糖廠家數4。其中糖房分佈以棹西鄉14，郭家鄉14，史家鄉13，東興鄉8家為多，漏棚則以東興57，松柏鄉53，史家鄉46，義民鄉44，至於東西北三附城鄉糖房與漏棚家數雖不多，然其資本總額與糖生產量所佔比率並不低。⁴²

沱江流域甘蔗製糖手工坊包括糖房、漏棚以及冰鋪。糖房以生產紅糖、糖清為主，對甘蔗進行初級加工，漏棚則自糖房購買糖清再次加工，生產白糖與桔糖；至於冰鋪則將白糖再轉製成冰糖。漏棚通常接近市場，多位於城市附近；糖房則近甘蔗產區，一般多在鄉間。⁴³由於糖房和漏棚製糖設備耗資頗巨，非一般蔗農所能經營；小農僅能以搭搞方式生產，增加種蔗利潤，糖房多為富農經營。糖房與漏棚的製糖，因糖品製造不同而有所分工，糖房製紅糖與糖清，糖清再經漏棚製成白糖，甚至冰糖出售；紅糖產區，糖房僅制紅糖；白糖產區，糖房通常兼制紅糖及糖清。紅糖直接於市場出售，糖清即轉售於漏棚。一般說來，經營漏棚所需的資本高於糖房。據調查，內江糖房平均資本5,037元，漏棚平均資本8,551元，至於糖房兼營漏棚者平均資本約為6,469元。⁴⁴此外糖房與漏棚的收益，紅糖區糖房（金堂、簡陽、資陽、球溪河）平均一日收益為25.15元，而白糖區糖房（資中、內江、富順）平均一日為29.36元，白糖區糖房大多兼營漏棚；因此製糖成本相對較低，所得利潤較高。而漏棚一日純益，以簡陽、資陽一帶紅糖區而言，可得297元左右，高於經營糖房利潤甚巨。⁴⁵

沱江流域糖房的經營或有不同，內江、資中一帶多自設，而簡陽、資陽一帶則多合租。至於漏棚的經營亦有兩種，其一為連帶經營，多為有資金的糧戶所經營，或獨資或合股，以資中一帶為多，一般與糖房連帶經營；其次為單獨經營，因漏棚所需資本較糖房大，故糖房多無力兼營，以內江、簡陽等地為多。冰鋪通常附於糖號或糖鋪，獨立經營的冰鋪較少。冰鋪以內江較多，分佈於東興鎮及縣城東壩街兩處，其次則為資中，至

⁴²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建設廳全宗號115案卷號1546，民國30年內江糖房漏棚統計表，如西附城鄉資本總額1,950,000元，於內江各鄉鎮中屬較高鄉鎮；至於生產數量東附城鄉為10,612千公斤，西附城鄉為4,674千公斤，北附城鄉為7,066千公斤，內江全縣為60,580千公斤，僅三附城鄉占全縣達37%；另參見金堂等七縣種蔗面積及產量與蔗糖產銷量暨糖房漏棚糖廠家數表。

⁴³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20-721。

⁴⁴ 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頁355。

⁴⁵ 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頁350-351。

於資陽、簡陽兩地則無冰舖。沱江流域糖房與漏棚的生產規模，以資中大糖房為例，僱工多達三百餘人，用牛三十餘隻，每日榨蔗七萬餘斤，出糖六十餘擔；大漏棚僱工亦達一百餘人，日可出糖30包左右（每包300-400斤），每年能漏糖40-50萬斤，小漏棚每年則可漏糖4-5萬斤。至於內江漏棚規模更大，大漏棚每年可漏糖達80-90萬斤，小漏棚亦可漏糖十餘萬斤左右。⁴⁶

內江地區糖房、漏棚僱工於清末民初即已相當普遍，一般糖房所需工人至少四十餘人，技術工人彼此分工，各司其職。此外糖房和漏棚僱有管事，少則一人，多則三人。一般在開搞前一月到職，事畢後一月解雇，有的漏棚也僱長期管事，⁴⁷負責帳目及場內事物處理。由於糖房工作期間甚短，管事、伙手、挑水等均係臨時雇工，按天計酬，停搞時即遣散。漏棚工人，除伙手外，一般視糖清多寡，雇白糖匠2-3人，為專業技術工人，係常年雇用，一般僱期由九月間開始至次年同時期止。糖匠通常於製糖季節結束後，即為主人作其他工作；如無工作時，亦照給工資。至於轉漏之熬糖匠與冰舖的熬糖匠，則係臨時僱請，按天計算工資。⁴⁸沱江流域各縣搞期不一，糖房開搞日數以富順、內江較高，資陽最低僅48天；至於漏棚開搞日數較糖房為長，內江長達277天，就是金堂仍有200天左右。⁴⁹糖房漏棚開搞期間，內江城市雇工群集，糖坊白煙繚繞之景象，可以想見。

抗戰以前，內江製糖技術變化不大；因資金不足，仍多土法制糖。製糖工具簡陋，清初榨蔗用的是簡單的木棍，初由一牛或二牛推轉；清中葉以後石軸取代木棍，民國以後牛力漸增為三牛或四牛，榨蔗石輥則由三牛一單兩雙在搞盤一側共推。抗戰中期，石輥採用鋼軸滾珠，同時將立式石輥改為橫式。至於製糖方法，清初熬糖原是小鍋小灶，清末民初糖房規模擴大，製糖的技術亦有所提高；抗戰以後，以離心機新法製糖頗具特色。離心機所製白糖，其一產量高，約為糖清之五成，土法製白糖僅約為糖清之三成左右；其次新法所製糖品純淨潔白，色澤勝於土法所製；且出糖迅速，離心機分蜜約13-15分鐘可得白糖，然傳統壓泥製糖需時20餘天；機器製糖獲利優厚，一般可達壓泥土法之

⁴⁶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13、頁414-415、頁417；劉志英，〈論近代四川沱江流域的製糖工業〉，頁15。

⁴⁷ 王東偉，〈解放前內江製糖業概況〉，《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1985年），頁192。

⁴⁸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03。

⁴⁹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北京：三聯書局，1957年），第3輯，頁680。

二倍。沱江流域制糖縣分相繼出現新式糖廠，動力多改為發電機、蒸汽機與蒸汽鍋爐；並且改用真空鍋、助晶機、離心機以及製糖的蒸餾塔取代傳統的土法熬糖。⁵⁰抗戰期間內江新式糖廠規模，詳見表六。其中糖廠資本額以中國、華農、華原三廠較大；產糖量則以中國、華農、一六糖廠為多。

表六 內江新式糖廠規模（1941-1943年）

廠名	地址	資本額（元）	產品數量（公斤）
華農	聖水寺	1,000,000	白糖110,000 桔糖110,000
華原	漆家灘	1,000,000	精糖 17,000 桔糖 30,000
一六	東興鎮	60,000	精糖 36,000 白糖 18,000 桔糖 9,000
西南	倒灣	40,000	
晶星	倒灣	60,000	
太極	倒灣	70,000	
利豐亨	裨木鎮	200,000	
中國	三元井	3,000,000	白糖750,000 桔糖750,000

資料來源：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24-425。本表資料分別根據1941、1943年統計資料製成。

抗戰時期除了新式糖廠興設外，沱江流域內江、資中、簡陽等糖產區，亦紛設酒精廠以漏水做為原料發展酒精工業。其中內江一地酒精廠規模尤大，計公民營酒精廠13家，月產酒精總量達267,000加侖，對於戰時工業與軍用燃料影響甚大。酒精廠月產量詳如表七。

⁵⁰ 王東偉，〈解放前內江製糖業概況〉，頁190；《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323-324。

表七 內江酒精廠與月產量（1943年）

廠名	每月產量（加侖）
四川省酒精廠	60,000
軍政部第一酒精廠	45,000
國防酒精廠	30,000
蜀豐酒精廠	30,000
輔仁化學工業社	15,000
中國煉糖公司酒精廠	15,000
中國勝利酒精廠	15,000
泰昌酒精廠	10,000
西川酒精廠	9,000
中川酒精廠	9,000
成永酒精廠	9,000
中興酒精廠	15,000
同昌酒精廠	5,000

資料來源：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537-538。

沱江流域甘蔗專作區內，由於甘蔗的專業生產以及手工業的結合，使得沱江流域各縣如內江、資中、資陽等地成為糖業重鎮。而甘蔗利潤不僅開創了沱江流域農民生計的來源，同時也累積了製糖工業的資本。抗戰以前，四川的糖品生產多屬土法的手工坊生產型態，抗戰期間隨著手搖離心機的推廣利用，內江、資中地區新式糖廠相繼創設，四川糖業始從傳統的家庭手工製糖蛻變為機械製糖工業。

不過，抗戰期間沱江流域的新法製糖推廣仍屬有限，且分佈亦不平均；新建糖廠大多集中於內江、資中兩地，幾近90%設於內江一地。且據1944年中國銀行內江分行的調查，沱江新法製糖只佔糖品總產量的30%，而70%的糖品仍為土法生產。⁵¹是以內江制糖雖已從農家手工業向工業轉型，且制糖手工業亦有助於城市與鄰近農村的互動；然其工業化歷程緩慢，利於城市成長的工業基礎尚屬薄弱。

⁵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333。

二、糖品貿易的專業化

沱江流域的糖品貿易擴大了內江地區對外的經濟聯繫，就其貿易網路而言，沱江流域糖品不僅可銷至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各縣，甚至兩湖、陝甘、貴州。如資中產糖，多供應安岳、遂寧、仁壽等縣所需，至於簡陽所產除銷往成都外，遂寧、瀘縣、江津、重慶等地市場亦多見。而瀘縣所產蔗糖，雖較內江所產為佳，不過產額過少，不足所需，仍須仰給於資、內一帶的供應。資、內一帶的糖，不僅供應瀘縣所需，桔糖尚可經由瀘縣集散轉銷兩湖或貴州。糖品的運銷過程中，瀘縣不僅是沱江流域糖的消費地，同時也是糖的集散地。瀘縣之外，包括長江沿岸的合江、江津、重慶、涪陵、萬縣以及嘉陵江流域的合川，皆為沱江糖品的重要集散地與轉運地。內江糖品銷至長江沿岸城市，若以平水時航程計算，從內江至瀘州需三至四日，至合江則需四至五天，至重慶要八天，至萬縣則需十五天左右，⁵²沱江產糖一般於內江集散後，經長江沿岸市場轉運至重慶或萬縣出口，銷至省外。

嘉陵江流域的合川同是糖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縣內糖幫多自資、內一帶販糖轉銷。其實資中、內江所產糖品沿長江水路多銷至川東南地區，而簡陽、資陽所產多銷往川西北。⁵³內江與重慶的糖品轉銷合川後，尚可由合川銷往渠江的渠縣、三匯、達縣等地，或沿嘉陵江至武勝、廣元入銷陝西。至於成都則是川西重要糖品集散地，沱江流域簡陽一帶產糖銷往成都後，可轉銷川南或銷往陝西的寶雞與西安一帶。大體說來，內江糖品除桔糖大量運銷兩湖外，白糖、紅糖、冰糖大多省內消費，少量銷往貴州、西康、雲南等省。⁵⁴民國時期的內江糖品，由於間接轉銷、苛捐附加過重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無形中增加糖品的運銷成本，不利於內糖的市場競爭。

其次糖品貿易的市場體系趨於專業化，沱江流域的糖品市場結構，產區市場以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為主，其中內江尤為沱江流域最大的糖品集散市場。至於銷區市場較具規模者，則如長江流域的合江、江津、重慶、涪陵、萬縣、宜昌、沙市等地為主；川西則以成都為樞紐，銷陝甘之糖，不時有取道成都、綿陽由陸路運往者。川北則以中江為中心，渠江與嘉陵江流域則以合川為轉運地。至於集中瀘縣、合江、江津、涪陵等地的糖品，除本地消費

⁵²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69。

⁵³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34；民國23年12月，重慶中國銀行文。

⁵⁴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69。

外，一部份則運銷黔滇地區。此外，轉銷兩湖之桔糖，販運至渝後，大都直接駁運輪船，運至宜昌、沙市與漢口等地，散銷於湘鄂各地；待1940年6月，宜、沙相繼失守後，始改以萬縣與三斗坪為主要集散市場。⁵⁵沱江流域糖品主要產銷市場結構，詳見表八所列。

表八 沱江流域糖品主要產銷市場（1941年）

產 區	集 散 市 場	來 源 地 點	銷 售 地 區
內 江	縣城、茂市鎮	內江、資中、資陽	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
	東興鎮	簡陽、富順、隆昌、榮昌、威遠	兩湖、貴州、陝甘
資 中	球溪河、縣城	本縣、內江、資陽	長江流域、嘉陵江流域
	太平鎮		兩湖、貴州、內江、簡陽、安岳、遂寧、仁壽
資 陽	王二溪、縣城	本縣、簡陽	長江流域、內江、資中、簡陽、安岳、遂寧、仁壽、嘉定
簡 陽	石橋、縣城、龍泉寺、三星場	本縣、資陽、資中	成都川西平原、遂寧、瀘縣江津、重慶、兩湖

資料來源：《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71。

沱江流域產地市場，其糖品交易與消費，範圍較大者，如金堂的趙家渡、簡陽的石橋、資中的球溪河及縣城兩處、內江縣城及白馬廟、資陽的王二溪、富順縣城等。其中最大者為內江，產地市場糖價皆視內江而起落；次為石橋，再次為球溪河、趙家渡等場市。⁵⁶內江之成為沱江流域糖業中心，由於糖產量高，且糖房與漏棚規模大，於是業糖商咸趨於此地採購，糖號行莊林立；同時以交通之故，沱江上游產糖亦多沿江下運集散於此。因此，內江不僅是糖產市場，同時也是沱江流域糖的集散市場；大半糖產經由沱江、長江運至重慶，轉銷他省。

⁵⁵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70；民國30年11月，楊壽標文。

⁵⁶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15；民國27年8月，四川省甘蔗試驗場文。

就整個市場體系而言，內江為糖品交易中心市場，而重慶則系主要的出口市場。其次沱江流域糖品貿易的重要場鎮，如內江的茂市鎮、資中球溪河、資陽王二溪、簡陽石橋、金堂趙家渡、富順牛佛渡等皆屬基層場市，內江則為糖品交易與集散中心。至於瀘縣、合川等地市場，不僅是糖消費地，也是糖品轉銷地，屬區域市場，而重慶與萬縣則是川糖出口城市。從基層場市到區域集散市場，以至於出口市場，各有其不同的交易規模與商業機能。其次，糖品貿易不僅刺激了沱江流域基層場市的發達，同時也促進了場市功能的專業化，如簡陽1877年時縣內場市數僅55個，至1927年時已增為79個，1930年代的內江，縣內場鎮相較於清末民初亦增加不少；特別是一些場市更發展為專業市場，如金堂的趙家渡、資中的球溪河等，⁵⁷球溪河即為沱江流域的紅糖市場。此外商業的需求突破了定期場期交易的限制，擴大為天天交易的市場型態。內江地區的場鎮規模因糖品貿易而擴大，市場商業機能因此益趨於專業化，此種商業結構的產業特徵，實有助於內江城市的發展。

肆、蔗糖經濟與城市發展

城市化通常係指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與農業地區轉變為城市的過程。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以為影響城市化的因素為包括人口密度、勞動分工、交通運輸、商業化程度與區間貿易等要項；此外城居人口的比率與居民生活方式的改變等皆可作為城市化的指標。⁵⁸施堅雅對於長江上游城市的研究發現，長江上游區域城市化較沿海地區為緩慢，清末（1893年）內江不過是長江上游區域21個中等城市貿易體系之一與200個較大城市之一，⁵⁹城市

⁵⁷ 簡陽場鎮數量變化，詳見（日）西川正夫著、王為儒譯，〈四川保路運動前夜的社會狀況〉，收於《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33；至於內江場鎮數量，清代變化不大，清末民初原內江縣僅大小場鎮集市22個，1945年內江鄉鎮數增為57個，1949年以後達70餘個，詳如高王凌，〈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場市網及其功能〉，收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輯，頁84、朱壽朋等纂，《內江縣志》（民國34年石印本），卷一、洪廬，〈內江市區地名謠諺選箋〉，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1993年），頁133；相關論述另參見隗瀛濤編，《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頁72-76，有關貿易與市場的討論。

⁵⁸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十九世紀中國的地區城市化〉，收於氏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66。

⁵⁹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十九世紀中國的地區城市化〉，收於氏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62、頁339。

規模尚不及瀘州、敘州府（宜賓）、順慶府（南充）、嘉定府（樂山）等地區城市；且清末民初原屬資州的內江縣，僅轄有大小場鎮集市22個而已。⁶⁰

近代內江的人口統計，相較於沱江流域各縣，人口數量均低於簡陽、資陽、資中地區。內江人口據縣志所載，清嘉慶17（1812）年承糧花戶35,174戶、男婦計177,777丁口；另據嘉慶《四川通志》的統計，校正後內江1812年戶口為28,119戶、男女133,807人，宣統年間（1909-1911）戶口調查為522,292人，1916年內江人口487,649人，1937年四川保甲戶口統計內江達621,187人，1941年的統計，人口減至587,644人，⁶¹若據上述人口統計估算人口年增率，則1812-1916年間約為千分之13，1916-1937年間約為千分之12左右；這期間內江人口年增率與資州直隸州屬五州縣（即沱江流域產糖縣分）大致相符。內江人口的變化，人口史研究的學者相信清末民初人口減少與戰亂兵災有關，1937-1941年間內江人口減少則應與自然災害有關。⁶²至於內江城居人口，呂實強對於清末民初四川城市發展的研究，並未有內江城居人口的統計；不過呂文以為整個四川城居人口比率在5%左右，瀘州城居人口僅5萬，宜賓（敘州府城）僅4.5萬，南充（順慶府城）僅3萬人。⁶³內江相較於這些區域城市，其城市化規模較小，吾人據5%的城居人口比率估算，則內江城居人口應有2.4萬人左右。整體而言，1930-1940年代四川全省城居人口雖有增加，但增長幅度很小，而鄉區人口始終保持在總人口的80%以上。⁶⁴此外，內江勞動人口的分化值得注意，農業人口比重雖多，然因糖業發展，工、商業人口比重增加。其中農民占人口比率73%，蔗農占農民人口50%，1937年的統計，內江農村人口中地主占6%，中農占29%，小農占65%。⁶⁵至於工人數量欠缺完整統計，民初糖業工人數

⁶⁰ 高王凌，〈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場市網及其功能〉，頁84；洪盧，〈內江市區地名謠諺選箋〉，頁133。

⁶¹ 內江人口統計，據朱襄虞、曾慶昌纂修，《內江縣志》（宣統3年緒修、民國14年刊本）卷二戶口，頁2；另參見李世平、程賢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頁44、頁59；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193、頁213。

⁶² 1930年代沱江流域資內地區自然災害嚴重，田土歉收，飢民四起；1936年8月內江大水，1937年初又逢旱災，飢民人數達20餘萬人，資中同年災民人數亦達30餘萬人，參見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內江市檔案館編，1989年）上冊，頁44-54。此外1937-1948年間四川第二行政區（含資中、資陽、內江等八縣）人口出現負成長，李世平以為與此一期間的政治、經濟、自然災害等因素有關，參見李世平、程賢敏，《近代四川人口》，頁116。

⁶³ 呂實強，〈清末民初期間四川城市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民國67年6月），頁773-776。

⁶⁴ 李世平、程賢敏，《近代四川人口》，頁189。

⁶⁵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67。

量1912年四川製糖業職工人數1,511人，占全國總數16%左右，⁶⁶其後若據1941年的統計，內江糖房、漏棚工人數達11萬人；⁶⁷吾人則就內江糖坊開搞期間投入糖業生產的雇工作估算，包括糖房與漏棚雇用熬糖技術工應有5-6千人，至於其他製糖所需臨時雇工則約有6-7萬人左右，⁶⁸此外商業人口應有不少，例如糖號提盤、經紀人、錢莊與金融從業人員等，據1944年的統計，內江僅經營和運銷糖品人口，幾占全縣人口的28%。⁶⁹

施堅雅對於長江上游地區城市貿易體系的研究發現，河流體系的結構決定了區域經濟中心地的位置，至於河流體系未能聯繫的缺陷，則由道路來彌補；盆地內重要區域城市以及基層集市的分佈，皆在水系線上。⁷⁰此一江河系統的地理位置及其交通運輸機能，說明了內江作為沱江流域城市貿易體系中心的合理性。不過內江雖有沱江水系藉以聯繫長江，然地多淺丘，岡巒層疊，陸路運輸相形困難；直到抗戰前夕，僅有成渝、井（自貢）內公路向外聯繫，且沱江將成渝公路截為兩段，大批物資運銷仍須靠木船水運，陸運主要依仗人力板車，汽車甚少。⁷¹陸路交通功能的侷限，雖然阻礙了內江商業化的程度；不過沱江水運的發達，仍強化了內江與川東、川西兩大經濟區域的聯繫以及互動。

一、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

沱江流域城市空間的變化與糖市場鎮的分佈有關。1930年代的內江糖品交易市場有二，其一為城內東壩街、大南街、大東門等處，東興鎮場期，為舊曆二、五、八日；另一為離城30里的茂市鎮（即城西的白馬廟），每逢三、六、九等日為場期，逢場期縣城糖號均派人趕

⁶⁶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輯，頁433-447；引自陳家澤，〈清末四川區域市場研究(1891-1911)〉，收於彭澤益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頁264。

⁶⁷ 楊壽標主編，《四川蔗糖產銷調查》（民國31年11月），頁36；引自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業〉，頁89。

⁶⁸ 內江糖房開搞期間，一般需雇工45-55人左右，以盛時糖房數1200家計，工人需6-7萬人；專業技術工熬糖匠每一糖房需2人，漏棚需白糖匠2-3人，漏棚家數1000家，至少需5-6千左右。

⁶⁹ 趙星洲、朱吉禮，〈三十三年內江經濟動態〉，《四川經濟季刊》，45卷2期，頁117-118；引自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業〉，頁88。

⁷⁰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收於氏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45。

⁷¹ 楊敏，〈建國內江汽車運輸業的發展情況簡述〉，《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1994年1月），頁100-101。

集，即不買糖亦藉以探聽市況。⁷²至於簡陽的精品交易，幾集中於石橋鎮（距縣城七里），全縣糖商十之七、八，集中於該處。資中的水糖交易，幾全集中於球溪鎮；白糖、桔糖的交易，則全集中於縣城。資陽精品交易，一般多在縣城進行。沱江一帶糖品交易地點，各地均以茶社（館）為談交場所。1942年食糖專賣後，各地始設有交易所，在交易場所由經紀人居間介紹買賣。通常一年之間的舊曆年底、端午節以及中秋節三個時節是糖品交易旺季；且一般鄉鎮糖品貿易集中於場市期交易，至於縣城則可天天進行交易。⁷³沱江流域重要糖市與場期，詳見表九。

表九 沱江流域各縣糖品交易市場（1930年代）

縣 別	交 易 地 點	交 易 時 間	市 場 情 形
內 江	縣 城	每日	內江市為四川糖業之中心，沱江流域各縣糖品多運躉此間，由糖號轉銷重慶及其他各地。
	茂 市 鎮	舊曆三六九	
資 中	東 興 鎮	舊曆二五八	為僅次於內江市場，球溪河為紅糖交易之市場。
	縣 城	舊曆一四七	
資 陽	球 溪 河	舊曆三六九	糖品主要銷售資內及川中各縣
	太 平 鎮	舊曆三六九	
簡 陽	王 二 溪	舊曆一四七	白桔糖約十分之九在石橋交易 其餘多為紅糖糖品委銷川西一帶
	縣 城	舊曆三六九	
金 堂	石 橋 鎮	舊曆三六九	簡陽等地運來之糖，多經此地 轉銷川西川北一帶。
	縣 城	舊曆一四七	
富 順	龍 泉 寺	舊曆一四七	本縣土產糖品銷長江流域。
	三 星 場	舊曆一四七	
	趙 家 渡	舊曆二五八	
	准 州	舊曆二五八	
	五 鳳 溪	舊曆三六九	
	牛 佛 渡	舊曆三六九	
	縣 城	每日	

資料來源：《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24-725。

⁷²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14。

⁷³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53。

事實上內江城區的發展與蔗糖工業以及糖品貿易相結合，糖品貿易主要集中於縣城、茂市鎮、東興鎮，糖坊則集中於茂市鎮、東興鎮、棹木鎮附近。1941年的統計，內江三分之一糖房漏棚集中於三鎮計232家，此外新建糖廠如一六糖廠在東興鎮，華源糖廠在棹木鎮、利豐亨在棹木鎮、中國聯合煉糖公司在三元井、華農糖廠在聖水寺、西南、晶星、太極糖廠在倒灣（城區附近）。⁷⁴至於生產蜜餞的作坊店舖，則主要集中於東壩鄉與東興鎮。由於內江產糖的重要，1942年2月財政部長孔祥熙不僅要求川康區食糖專賣局遷至內江，同時於茂市鎮、棹木鎮、史家街、吳家舖、東興鎮、便民鄉、龍門鎮等地設立業務所。⁷⁵內江縣內除縣城外，城東的東興鎮、城西的茂市鎮、城南的棹木鎮皆因糖而興，成為工商業繁榮之區。城內的空間發展，大南街、大東街、河壩街、東壩街糖號林立，大南街、東壩街、大東門一帶經紀商群集，其中大東街、河壩街、東興街均臨沱江，特別是河壩街為商貨集散轉運之碼頭，大小船隻雲集，且是內江大米市，由於河運機能強，商業發達，成為內江城內最繁榮地區。⁷⁶至於棹木鎮亦系沱江轉運碼頭之一，所以工商發達，倒是城西的茂市鎮，地雖未臨沱江，卻因糖業而成為內江重要場鎮。整體而言，內江縣內的空間發展，由城內、城南而至城西場鎮經濟較為發達，城北場鎮規模較小且發展較為緩慢。

二、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

內江地區因糖業的發達，出現一些新興的社會組織與團體，包括糖幫組織、經紀人以及錢莊、金融業機構等，內江糖品的運銷組織如糖號，專營販賣，多係批發，沱江流域糖幫以內江家數最多。內江糖號略分三種：本幫：為本縣糖商所組織，家數最多，同時可受外縣糖商委託代為進貨。外幫：外縣糖商在內江設號，長期住內辦貨者，如重慶、江津、忠州、富順、瀘縣、綦江、豐都等糖幫。販莊：鄰近各縣糖商，未在內江設號，僅於糖品上市攜款來內採辦者，販莊來時，人數極多，糖品銷量為數甚巨。一般而言，糖號所販糖品種類，並不限定，視糖品銷量，市價及糖貨存底而定。⁷⁷

⁷⁴ 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業〉，頁85。

⁷⁵ 楊修武、鍾詩懋，〈川康區食糖專賣概述〉，《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8年），頁95、頁97。

⁷⁶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55；另見陰鈞陶供稿、范增源整理，〈內江城隍廟〉，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1994年），頁209。

⁷⁷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53，民國23年12月，重慶中國銀行文。

內江糖品販運商，長期設莊經營者有百餘家，外幫糖號又稱為行商，此類行商在各地多設有分號，便於購糖運銷各地，因業主及總號之不同，行商有內江幫、津渝幫、瀘合幫、土沱幫、合州幫、忠萬幫等。或分為上河幫與下河幫，其中上河幫，包括資中、資陽、簡陽一帶行商；下河幫則包括江津、重慶、涪陵、忠州、合江、萬縣等地行商。各幫中以津渝幫、內江幫人數最多，資力最為雄厚。這類糖號主要集中於內江，他縣較少。1942年食糖專賣實施以後，業糖商則分為承銷商與零售商二種，至1943年4月15日止，各縣登記的承銷商及零售商家數，其中承銷商以重慶（186家）、內江（135家）為多，至於零售商家數則以重慶（2,234家）與成都（1,801家）為多，⁷⁹重慶、內江兩地承銷商家數計321家，佔登記承銷商總數910家的35%，可見糖幫組織仍以重慶、內江糖號規模較大。⁸⁰

內江糖號除販運商、製糖商外，糖品交易已發展出經紀人制度。內江糖品經紀人分白糖幫與紅糖幫，其中白糖幫25家，紅糖幫7家。每家有辨別糖品貨色、評議糖價的提盤先生一位，以及擔任跑路及吊秤人員數人。白糖幫除仲介白糖、桔糖與冰糖交易外，亦能介紹紅糖交易，但僅限於本縣出產者；至於紅糖幫則僅能介紹外縣運來的紅糖及內江本地出產的漏水與紅糖。⁸¹內江糖業經紀人，主要集中於城內的大南街、大東門、東壩街以及城西的茂市鎮等。詳如表十一所列。

表十一、內江糖業經紀人一覽表（1934年）

姓 名	住 址	姓 名	住 址
鄧 席 儒	大 南 街	李 學 初	大 東 門
鄧 金 華	大 南 街	李 竹 之	大 東 門
吳 自 遠	大 南 街	劉 祿 階	大 東 門
魏 昌 元	大 南 街	吳 澤 周	大 東 門
吳 樸 三	大 南 街	邱 德 昌	大 東 門

⁷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59-660，頁668；余農治，〈反動統治時期的內江糖業〉，收於《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1961年），頁81。

⁸⁰ 《內江糖業檔案資料選編》，頁668。

⁸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659-660，民國30年11月，楊壽標文；另據1938年的統計，內江經紀人白糖幫有經紀人36家，紅糖經紀人共有50餘人。

邱吉榮	大南街	邱德桂	大東門
張清如	大南街	吳子華	大東門
張福廷	大南街	陳鴻年	大東門
馮長盛	大南街	蕭文斗	大東門
李桂廷	東壩街	廖福堂	東壩街
李金五	東壩街	張紹成	東壩街
趙炳榮	東壩街	郭向陽	東壩街
吳仲清	東壩街	雷子卿	茂市鎮
邱德三	東壩街	曾仲和	茂市鎮
邱明章	東壩街	曹仲元	茂市鎮
劉錫安	東壩街	潘文西	茂市鎮
朱文斗	東壩街	曾榮光	茂市鎮
吳介藩	東壩街	甘樹和	茂市鎮
徐德明	東壩街	羅福成	茂市鎮
門桂廷	東壩街		

資料來源：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13-714。

至於簡陽縣除經紀人外，另有一種代庄，代客買賣糖品，又分代賣糖及代買糖者二種。該縣出售白桔水糖者多將貨運至石橋鎮，委託代賣庄代為出售，代賣庄代為出售糖品外，並負責收款交貨與下載等工作，力資則由代賣庄支付，交易完畢後，由代賣庄抽1%行佣。代買庄則係代人選貨。一般說來，簡陽委託代賣庄售糖者甚多，委託代買庄買糖者較少；實乃賣糖手續較煩，賣主樂於委託代庄代辦。⁸²

值得注意的是，內江地區的糖品交易與運銷過程中，發展出經紀人制度，且糖幫組織依交易糖品分類為白糖幫與紅糖幫，顯見糖品貿易的趨於專業化。而糖幫組織不論是本幫與外幫，各糖幫除於內江設庄外，各地皆設有分號，不僅有助於區域間糖品貿易的進行，同時也

⁸²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714-716，民國23年12月，重慶中國銀行文。

有助於糖品市場網路的擴大。⁸³此外商業公會的組織與影響力亦日漸擴大，如糖業組織發展出制糖業公會，1943年時已有會員546人，糖業公會（販運商）會員160餘人，經紀人業公會內分8幫，其中白糖幫有25家77人，紅糖幫有7家19人。⁸⁴內江由於糖業的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其他貿易的發展，如糧食業、船運業、金融業等商號咸皆聚集內江。以糧食貿易而言，由於內江地區高達40-50%土地種植甘蔗，常年糧食不足，一旦糖房開搞時需糧更多，金堂、瀘州等地大米得以供銷內江。內江產糖運銷外地，復從外地轉輸米糧，無形中刺激了沱江流域區域間的糖米貿易，⁸⁵內江梓潼木船雲集，轉運碼頭卸貨之際，船工喧囂之聲不絕於耳。其次由於糖品貿易，內江金融組織遍佈，除錢莊外，新興金融機構如1930年中國銀行於內江設分行，1933年聚興誠銀行亦設內江分行，1934年四川地方銀行興設內江辦事處，其後四川建設銀行亦相繼成立內江分行；內江則為上述銀行設有分行之唯一沱江流域城市，據1944年的統計，內江一地各銀行錢莊設有分行辦事處者多達41家，⁸⁶可見內江不僅是沱江流域糖業中心，同時也是沱江流域的金融中心。由於糖品貿易的擴大，內江社會結構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上述糖號、行莊、船運、金融等商會公會的出現及其專業化，顯見內江社會城市化的傾向；且糖商、經紀人、金融從業人員的增加，無形中也促使了內江社會階層的多元化。

伍、城鄉社會的變遷

一、蔗農經濟與城鄉社會

沱江流域農民選擇種植甘蔗與其農業生態、土地租佃制度以及甘蔗利潤直接相關。沱江流域各縣植蔗利潤，據1938年的調查，蔗農每畝生產成本以地租4.6元最高，約為總成本的20%，其次為蔗種4.48元，肥料為3.7元；每畝收入僅有2.38元，再計間作收入1.14元，則蔗農

⁸³ 拙作，〈農業商品化與社會變遷：以四川盆地為中心（1861-1937）〉（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刊稿，民國87年），第三章，頁70。

⁸⁴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402、頁659。

⁸⁵ 黃江陵，〈解放前內江航運業〉，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1987年），頁135。

⁸⁶ 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制糖工業〉，頁81-82；另見張學君、張莉紅，《四川近代工業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48。

栽培甘蔗，每畝所得利潤亦不過3.52元。⁸⁷另據方濱生的調查，白糖區植蔗利潤每畝平均可得6.3元（其中內江最高為8.9元、資中3.8元、富順6.5元）；水糖區則相對較低，平均各縣每畝僅有1.9元（金堂為1.3元、簡陽為1.4元、資陽1.1元、球溪河稍高為3.4元）。⁸⁸若以內江每一農家平均植蔗面積25畝計，則植蔗農家可獲225元左右；⁸⁹二百餘元的收入，相當於內江小學教師一年的工資，若於戰前一家三口，尚可餬口；⁹⁰抗戰以後，物價飛漲六、七倍之多，生活尤見其困難。

事實上植蔗區農民植蔗利潤各有不同，如佃農因需負擔更高的生產成本（例如地租成本），而且資金又嫌不足，有時甚至出現收入不敷或負債的情形。以內江佃農植蔗為例，佃農除納錢租外，尚需納實物地租（通常為甘蔗），即上繳糧食收成的一半，內江稱作水租；此外亦需提供力役，包括給地主挑水、抬轎等。且蔗農一般必須預繳地租，即所謂的「先稱後種」。⁹¹吾人從內江200家農戶租佃比例的調查發現，其中佃農戶數高達118戶，約佔59%；佃農比率在沱江流域甚高，如資中蔗農人口中，佃農約佔60%，且全縣蔗農中，負債者約佔8%。⁹²內江地區的租佃惡習難改，雖然佃農屢次請願要求取消蔗租預租，以及地租半納甘蔗半納雜糧，皆無法如願。

蔗農於資金不足或遇收支不抵時，祇得借貸或預賣甘蔗以抵債，此種情形（即賣青山）於內江、富順一帶甚為普遍；甚至有預賣糖清或紅糖者，如資中、簡陽、資陽等地。1930年代後期資、內一帶蔗農預賣情形，如內江東興、永興兩鄉的預賣比率即高達93%，資中菜子溝預賣比率達87%，大生堂亦有59%左右。⁹³蔗農預賣甘蔗，若遇收成不足，長項利息高達

⁸⁷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74。

⁸⁸ 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臺北：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藏），頁331-333；蔗農收入的最大差別，主要在於甘蔗的平均價格，白糖區蔗價為水糖區的一倍多。由於甘蔗品種與出糖量影響蔗價高低，水糖區蔗種費用支出，平均僅3.4元而已，白糖區卻高達9.8元。

⁸⁹ 沱江流域植蔗面積統計，見四川省甘蔗試驗場編，《沱江流域蔗糖業調查報告》（民國27年8月），第四章，頁1-2。

⁹⁰ 1932年內江小學教師工資待遇，每月約200-300元左右，見傅佑榮，〈民國時期內江縣教師的薪津待遇〉，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1994年），頁115。

⁹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82；1980年11月25日，余農治文。另見劉建純，〈內江糖業史料瑣記〉，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1988年），頁46。

⁹² 鍾崇敏，《四川蔗糖產銷調查》，頁98，據該書所載，資中縣農民約55萬人，蔗農約30萬人，較方濱生所言數目為少。

⁹³ 甘蔗試驗場編，《沱江流域蔗糖業調查報告》第四章，頁4-6；轉引自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

三分月利，往往本息累積終致負債佃農無力償還。⁹⁴事實上，沱江流域蔗農預賣甘蔗，往往得不到好價錢，如冬季採收甘蔗一萬斤一般可賣60元左右，青山價則僅有38-40元左右，蔗農每萬斤蔗減少將近約20元的利潤。⁹⁵蔗農賣青山之嚴重，僅內江一地比例高達90%，資中各地平均亦在74%左右。此種現象除了反映蔗農普遍資金不足，亟需現金的事實外，主要的原因在於內江一帶糖房購蔗有一定的範圍，一般蔗土多相鄰糖房3-4里以內，再遠即因人力運輸成本增加，糖房多不願購買，所以蔗農交易時，在糖價上往往無法取得合理的價格。民國時期，沱江流域蔗區，蔗農除賣青山外，賣預糖者亦甚普遍，包括資中、資陽、簡陽地區，蔗農賣預糖的比率高達70%；⁹⁶通常一萬斤甘蔗可預賣糖清一千斤，不過此種現象在內江較少。1939年預糖價值每千斤約60-90元不等，其後糖價每千斤漲至270-280元，一般預賣蔗農損失極為慘重。⁹⁷

綜觀沱江流域蔗農經濟，蔗農由於資金不足，出現賣青山賣預糖的情形，甚至出現收益不敷成本的現象，然而何以內江農民仍然以種蔗維生呢？其主要的原因是沱江流域山多田少，且乏水利灌溉設施，只適於種植雜糧作物，此乃自然生態之限制。其次，租佃制度盛行，地租負擔重，而種植甘蔗往往於賣青山或賣預糖時，即可獲一筆躉錢，可上完地租；佃農或輪栽雜糧間作玉米，並利用農閒時，從事勞力工作，藉以增加收入，補貼家用。⁹⁸如此看來，現金的高度需求，實為沱江流域農民考慮經營蔗業的重要因素。至於內江地區一般蔗農的生活，如1936年甘蔗試驗場對於沱江農家生活的調查，所得印象是「生活太苦，每天兩餐，食米者僅佔4/10，其餘均以蕃苕、玉蜀黍、蔬菜等，此飯甚至有不能果腹者」。⁹⁹平時蔗農生活雖苦，以農家生活之儉樸，餬口維生尚屬容易；若逢荒年，則窮困農民食白泥（仙米）者時有耳聞。

資料》，第2輯，頁438。

⁹⁴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頁732，如蔗農在收成之時，欠繳二個糖（五百斤為一個，一千斤為兩個），第二年須以三個糖（一千五百斤）繳與糖戶，以償還去年未繳之債務；由於資金不足，層層轉借，重重剝削，如漏棚向銀行貸款月息僅一分八釐，轉借與糖房月息則為二分至二分五釐，糖房再轉借與蔗農月息即增至三分至四分以上，參見趙永餘，〈內江之糖業〉，《四川月報》，11卷2期（民國26年8月），頁50。

⁹⁵ 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頁340。

⁹⁶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88；另見劉建純，〈內江糖業史料瑣記〉，頁48。

⁹⁷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06；民國28年11月22日，資陽縣第四區各鄉鎮公民代表馬光宇等呈文。

⁹⁸ 余農治，〈反動統治時期的內江糖業〉，頁86。

⁹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84。

且沱江流域蔗農所需糧食往往不足，必須依賴鄰縣，如資陽食米向需由安岳、樂至兩縣接濟；簡陽食米則由趙鎮、樂至、仁壽等地供應，內江食米多依賴金堂、瀘州大米；此種情形改變了傳統農家自給自足的生產型態，使得農民與市場聯繫更加緊密，至於內江農家農產銷售甘蔗幾全銷售市場，至於高粱、小麥亦有70%左右銷向市場。¹⁰⁰此外產糖地區一旦遇天災，則糧食出現危機，民心恐慌將甚。如1937年1月，內江「秋收既歉，冬旱仍重，來春收成難望，所恃活動全縣市面之蔗糖收入，全縣損失不失數百萬元，農民恐慌之象，異於尋常」，¹⁰¹1940年資中球溪河「糖即陡跌，且無銷場，而雜糧食米則每斗竟漲十五、六元不等，非常市面，駭人聽聞」，¹⁰²1945年4月內江「糧價因高漲，縣屬四鄉飢民群起，甚甚迫而走險，為盜為匪，搶劫層出，災情嚴重，盜匪堪虞」，¹⁰³1946年簡陽「物價上揚，農村已呈恐怖，危機四伏」。¹⁰⁴糧食危機容易形成社會治安的惡化，如內江「飢饉恐慌不可名狀，縣屬北區張家寺、稗木鎮一帶，常有飢民嘯聚，估逼索糧」，¹⁰⁵甚而危急他鄉，如威遠即受流民之擾，「內江張家壩有吃大戶飢民二三百人入我高市場境內，分駐鄉村民房，洵洵索食，又有資中第四區宋家場、陳家場之飢民成群，亦入我境索食……飢民有流離成群索食大戶之舉，若流離成群，更進而轉轉他縣就食，則影響地方治安」，¹⁰⁶糧食危機所造成的物價上漲、飢民群起搶劫，導致農村社會的不安與失序。

二、社會衝突：1940年代的蔗農事件

1940年代的沱江流域蔗糖產區，由於物價波動甚遽，蔗農時有破產之虞。加以長期以來糖商、政府的忽視蔗農生計，因此出現了規模不小的社會衝突。大規模蔗農事件，主要發生於資、內兩地；分別是1943年資中球溪河業務所被砸事件以及1946-1947年內江蔗農請願事件與1947年資中蔗農搗毀縣政府事件。¹⁰⁷

¹⁰⁰ 張肖梅編，《四川經濟參考資料》，頁M38。

¹⁰¹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內江市檔案館，1989年）上冊，頁45。

¹⁰²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上冊，頁149，1940年6月26日資中球溪河鎮農會呈文。

¹⁰³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上冊，頁249，內江縣政府呈文。

¹⁰⁴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上冊，頁268。

¹⁰⁵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上冊，頁47。

¹⁰⁶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上冊，頁106；威遠縣政府1937年呈文。

¹⁰⁷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44。

糖價低落不僅影響農民植蔗意願，更引起蔗農對地主、糖商以及政府的不滿。如資、內兩縣蔗農多係佃農，其中佃農均係繳納錢租，地主鑑於物價上漲，錢租不如實物租有利，相率改錢租為實物地租，以致佃農所種甘蔗大部份需繳與地主。惟生產成本則仍由佃農擔負，且糖業課徵統稅，稅率高達25%，甘蔗生產成本益重，佃農因種蔗成本高，不得不改種其他作物，¹⁰⁸此種租佃制度之不合理、佃農之無奈，可想而知。此外蔗農資金不足，而政府貸款又往往不足，不少蔗農只好棄種甘蔗。如1941年甘蔗生產成本每萬土為300元，政府貸款為200元。1942年甘蔗成本已增至1200-1300元，而政府仍只貸200元，政府貸款不能隨蔗價增加，即原有數額亦不能維持，致使蔗農求助無門。¹⁰⁹若逢天災，蔗產減收，政府賑濟不周，則對於農村經濟影響甚深。1948年內江因洪水氾濫，災情嚴重，沿江一帶所種甘蔗，均被洪流淹沒沖刷，當年產量較1946-1947兩年，約減產6/10，¹¹⁰災民無以維生者甚眾。

此外，沱江流域各縣蔗糖交易不公的情形多見，以致蔗農利益受損，如1940年12月內江縣永興鄉民蕭克明等指控「糖幫主席李漢人，人稱土皇帝，於永興鄉開設糖房兩處，一處地名蓮花灣，一處地名次溝。不尊法令，吊青山甘蔗70公斤作為58斤半計算給價，兩相比較，每70公斤多吊青山11斤半。」，¹¹¹糖商往往於砍蔗過秤時讓蔗農吃虧。且糖幫勢力多滲入或控制地方參議會，官商勾結壟斷利益，多未顧及蔗農生計，如改蔗糖評價為自由買賣，即有失公平之處。

內江蔗糖價格因評價制度，引發蔗農、糖商利益的嚴重衝突，蔗農要求政府評價雖未必合理；然而糖價高時，蔗農卻絲毫未蒙其利，戰時政府專賣食糖，蔗農配合政策已多所犧牲，糖商貪圖己利要求開放自由交易，政府豈有坐視之理。況蔗糖評價原在維護蔗農糖房漏棚三方利益，且行之多年；1943年1月資中因蔗糖核價久懸未定，而農曆年關迫近，蔗農與糖房糖房與漏棚間帳款無法結清，數百蔗農於是進城群聚資中食糖專賣分局，毆傷分局長李錫勛；5月蔗農更聚眾六七百人，要求提高紅糖價格，並搗毀球溪鎮業務所。¹¹²

¹⁰⁸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10；民國32年4月17日，中國農民銀行內江支行函。

¹⁰⁹ 《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28；民國31年8月4日，財政部川康區食糖專賣局長曹仲植呈文。

¹¹⁰ 1948年7月17日內江水災嚴重，此外1946年7月內江旱災，受災人數達40餘萬人，1949年7月內江又遭旱災，對於農村經濟影響甚深；見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上冊，內江自然災害大事年表。

¹¹¹ 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11；1940年12月內江縣永興鄉民蕭克明等四人呈文。

¹¹² 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45；民國32年4月22日四川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

1946年內江蔗農因預買甘蔗引起糾紛，蔗農質疑糖幫主席王有為與縣議會議長雷禹三串同大量預買蔗糖，因而近城15鄉鎮蔗農代表群聚請願「時至今日，蔗價每萬斤已漲至三十餘萬元，因此新價與預賣之價相差數倍，蔗農虧折過大，難免不起糾紛」。¹¹³且自1946年11月起，內江蔗農請願呈文不斷，內江縣政府成立之蔗農糾紛調解會，亦不能為蔗糖雙方所接受，是以內江松柏鄉黎兆奎等人組蔗農請願團呈文省府，內江龔家鄉蔗農代表潘慶銘等亦先後請願，指陳官商勾結，糖商藉蔗農青黃不接之際，以賤價收買甘蔗，此外糖商貸款月息重，蔗價低廉致蔗農生活無以維持，內江蔗農希望維持甘蔗評價，¹¹⁴藉以保障收益之心聲。內江蔗農黃俊培等呈文省府指出「春夏之間，農等大都需款，糖商乘機放款抵蔗，所言皆屬接濟之詞，不疑其壟斷狡狠，事後重利滾算勒買甘蔗，每萬斤只准作價八、九萬元，即多者亦不過十一、二萬元」。¹¹⁵對於糖商的違禁預買，蔗農請願的同時，不少蔗農甚至憤而擋蔗不砍，以待政府的評價。

1946年12月23日四川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田伯施給省府的呈文，道出了糖商欲維持賤價收買甘蔗之預約事實；田文同時指出民國35年蔗價之低，「34年評價白糖價每萬公斤為九百萬元，而蔗價每萬公斤為十九萬元，本年當議價時白糖每萬公斤值二千五、六百萬元，較上年增值將達三倍，而蔗價較上年僅增一倍，比較之歷年為最低」。¹¹⁶田伯施雖明瞭蔗價之不合理，然公文層層轉遞旅行，卻未見具體之解決；對於蔗農的請願，內江縣府與參議會處理態度並不積極，甚至多所拖延。由於1945年蔗價評定過低，經蔗農多次請願後，內江縣政府終於1946年12月25日由縣長黃希濂訓令處理蔗糖糾紛原則如下：一、蔗價標準每萬公斤以38萬元為原則，二、已用價款每月六分不計複息，三、已用價款截至農曆10月15日止，四、蔗價一律於農曆年底前付清，五、離沱江30華里以外者，每萬公斤減少一萬二千元。¹¹⁷內江縣政府所評蔗價雖未及蔗農要求的每萬斤40萬元標準，然一般蔗農尚可接受；¹¹⁸不過糖商多表示不能接受，如1947年內江制糖商謝吉仁、鄧光昌、傅瀚文等人於元月至七月間向四川省政府多次訴願，指陳不服

員兼保安司令田伯施呈文；頁247；民國32年6月12日財政部川康區食糖專賣局函。

¹¹³ 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51。

¹¹⁴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政府建設廳建三第3289號、第3343號、第3497號。

¹¹⁵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政府建設廳建三第3496號，內江蔗農黃俊培等呈文省府。

¹¹⁶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政府建設廳建三第3821號。

¹¹⁷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政府建設廳建三第340號。

¹¹⁸ 趙文林，〈1947年內江蔗農請願記〉，收於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263。

內江縣政府評定蔗價每萬斤為38萬元。¹¹⁹此外1947年內江制糖公會理事長傅瀚文更呈文省府，以為近年因物價波動、不良份子乘機鼓動蔗戶製造事端。¹²⁰

沱江流域蔗農長期對於蔗價的不滿，引發了蔗農的強烈抗議，內江資中地區從1946年起至1947年初的請願運動持續不斷，尤其是資中蔗農事件規模不小。1947年初，資中甘蔗評價過低，蔗農四百餘人赴縣府請願，資中縣長游伯鏞命警局機槍掃射，造成請願蔗農死傷二十餘人，爆發一八糖潮。事起之因，乃資中蔗農以為「四鄉農民以蔗糖議價過低，紛赴縣府請願，不期而集者約千人，……民眾為糖價糾紛請願，自非匪徒可比，司治安責任者，只能從中調解，何能開槍射擊，傷及民眾」，¹²¹流彈所及，傷及民眾，然資中縣長游伯鏞尤以為「資中民風素本醇良，今茲突有此乖戾暴動行為，顯有奸人乘機從中利用，貽害地方」；¹²²此一事件田伯施以為農會涉入糾眾，向政府要挾，結果1947年8月農會理事長何衡九等被訴妨害公務秩序及毀損，共同教唆他人公然聚眾等罪嫌，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資中縣府處理蔗農事件之強硬態度，引起縣民的不滿；王仁舟等呈文指控資中縣長游伯鏞違法，指陳游伯鏞與專員田伯施夥同地方土劣，借公營利，仗勢漁利，大資經營糖業，企圖剝削農民；糖商進賄勾結縣府，縣府對糖價爭執，置之不理等。¹²³此外，上海、南京等地專科以上學校資中同學會具呈文四川省參議會聲援請願蔗農，指陳游伯鏞草菅民命。

1940年代的資、內地區除蔗農事件之外，尚有糖廠工人運動，如1946年中國聯合煉糖廠停工，解雇工人，引起糖廠工人不滿，引發集體抗爭，¹²⁴社會的衝突已出現於沱江流域的城鄉社會。從內江蔗農請願運動到資中蔗農搗毀縣府事件以及中國煉糖廠工人抗爭事件，足見內江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蔗農、糖商利潤分配的未盡合理，以及官商勾結下社會正義的不彰；導致農民與糖廠工人將長期的不滿、以及無奈，投向行政效率不高的地方政府表示抗議，然卻未見地方政府絲毫的檢討與回應。1940年代沱江流域城鄉的社會衝突，不全是農商利益的對立，社會衝突的日益激化，多少暴露了傳統中國行政體系中所欠缺的行政效率，

¹¹⁹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第1932號，民國36年7月8日內江制糖商謝吉仁等呈文；謝等代表內江製糖業連署糖商達326人。

¹²⁰ 四川省檔案館藏，全宗號115案卷號1549：四川省政府建設廳第1932號，民國36年6月14日內江制糖公會理事長傅瀚文呈文。

¹²¹ 四川省檔案館藏，全宗號115案卷 1547：四川省建設廳建三第0303號，民婦孫文彩呈文。

¹²² 四川省檔案館藏，全宗號115案卷1547：四川省建設廳建三第2686號，游伯鏞呈報事變經過。

¹²³ 四川省檔案館藏，全宗號115案卷 1547：四川省建設廳建三第1408號。

¹²⁴ 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頁14。

而那正是傳統社會城市化過程中的特徵之一。

陸、結 語

蔗糖經濟作為沱江流域農民的重要生計，同時也是內江地區最重要的產業活動之一，唯由於1930年代沱江流域賣青山、賣預糖情形普遍，造成蔗糖產銷結構中的剝削嚴重。吾人發現：儘管內江一帶蔗農致力於植蔗生產，農業所得仍屬有限，且蔗農獲利遠不及糖房與漏棚經營者，此一現象的存續，反映了農業產銷的失衡，實不利於內江地區的蔗糖生產。

抗戰時期沱江流域糖業再現生機，後方各省依賴川糖尤深，此乃形勢使然。由於國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一則技術更新，引進改良蔗種、新式機器制糖，以致於沱江流域食糖、酒精工業繁榮，不過戰時政府的食糖專賣政策、蔗糖評價措施等，復又干預了蔗糖經濟的市場機能；探究其實，政府對於糖業生產的壟斷與控制，雖有財政上的考量，然對於內江糖業的衝擊與影響頗深。更以戰後內江制糖技術人員流失，臺糖進口衝擊，以致於內江糖業由盛而衰；尤其是1945-1949年間通貨膨脹嚴重，內江蔗農要求政府評價，居間協調農商衝突，然而其時政府力量反未能介入，造成蔗農損失慘重，糖商不滿，蔗業蕭條。

沱江流域內江地區蔗農專業化比率高，內江、資中俱在50%以上，清末民初由於政府政策的鼓勵、稅賦等生產條件相對較佳，糖業盛極一時。唯整體而言，內江地區氣候、交通條件差，種蔗方式與制糖技術落後，糖品的市場競爭力弱。普遍而言，沱江流域蔗農資金不足，以致於農村高利貸盛行。抗戰時期政府雖有蔗糖貸款，不過承貸不實，貪污情形嚴重，蔗農未見便利許多；是以戰後出現1946年內江蔗農請願事件、1947年資中更出現蔗農搗毀警察廳事件，這裡頭反映了城市內部農商階層的社會衝突加劇。

內江城市的崛起與蔗糖經濟發展密不可分，糖業的式微，更造成了內江城市發展的遲滯。就內江城市的地理條件而言，內江的水路碼頭居沱江與長江水系的要衝，沱江上游貨物沿江而下集散於內江，可下達重慶出口；此一水運交通機能，是內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清中葉以後內江糖業發展迅速；內江糖產量高，糖房、漏棚規模大，各地糖商咸趨於此，縣內糖號行庄林立，城內糖幫組織、糖商經紀、金融體系數量之眾，於沱江流域產糖縣分，無出其右者。此種社會結構的多元化，可說是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整體而言，蔗糖經濟導致沱江流域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內江城市農工商業與市場密切結合。內江糖業的專

業化，藉由糖品貿易，與沱江流域的城鎮形成一經濟網路體系，從城市化的指標而言：內江經營與運銷糖品的人口比率達28%，工商人口比率增加，出現產業工人、經紀人等新興社會階層；社會關係因糖業出現業緣組織與關係。其次，就空間結構而言，內江糖品交易，從定期的農村集市發展為日日交易的專業化市鎮，糖房、漏棚、糖商、糖號集中於城區市街。清末至1949年內江從一個交通、航運與貨物集散的市鎮，因糖業轉變為工業、商業機能的區域城市，成為沱江流域的經濟金融中心。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四川省檔案館藏，《四川省建設廳檔案》全宗號115：案卷號1546、1547、1549。

內江地區檔案館編，《內江蔗糖檔案資料選編》（內江：內江地區檔案館，1984年）。

四川大學歷史系藏，《巴縣檔案》抄本。

(二) 地方志、史料群與調查報告

王果纂修，《內江縣志要》（道光25年刊本）。

朱襄虞、曾慶昌纂修，《內江縣志》（宣統3年續修、民國14年刊本）。

朱壽朋、伍應奎等纂，《內江縣志》（民國34年石印本）。

楊修武、葉自明編，《內江自然災害檔案史料》（內江市檔案館，1989年）上冊。

游時敏，《四川近代貿易史料》。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

魯子健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冊。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北京：三聯書局，1957年。

張肖梅編，《四川經濟參考資料》。上海：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民國28年。

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7年。

四川省甘蔗試驗場編，《沱江流域蔗糖業調查報告》，民國27年8月。

楊壽標主編，《四川蔗糖產銷調查》，民國31年11月。

方濱生，《四川蔗糖調查報告》。出版資料不詳，臺北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鍾崇敏，《四川蔗糖產銷調查》。重慶：民國30年。

(三)專書

周詢，《蜀海叢談》。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5年。

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隗瀛濤編，《辛亥革命與四川社會》。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年。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

李世平、程賢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

郭聲波，《四川歷史農業地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藍勇，《歷史時期西南經濟開發與生態變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周開慶，《四川經濟志》。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

張學君、張莉紅，《四川近代工業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四)論文

王國斌，〈西方學界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趨勢〉，《國史館館刊》，復刊20期（民國85年6月），頁7-12。

陳家澤，〈清末四川區域市場研究（1891-1911）〉，收於彭澤益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頁312-370。

高王凌，〈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場市網及其功能〉，收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集，頁74-92。

呂實強，〈清末民初期間四川城市的發展〉，《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民國67年6月），頁773-792。

劉志英，〈論近代沱江流域的製糖工業〉（四川大學歷史系未刊碩士論文，1992年），92頁。

陳祥雲，〈農業商品化與社會變遷：以四川盆地爲中心（1861-1937）〉（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未刊博士論文，民國87年），326頁。

趙永餘，〈內江之糖業〉，《四川月報》，11卷2期（重慶：中國銀行，民國26年8月），頁35-50。

楊永奎等，〈內江簡陽甘蔗及糖業調查〉，《四川月報》，8卷4期（民國25年4月），頁1-24。

〈省府在內江設甘蔗試驗場〉，《四川月報》，8卷5期（重慶：中國銀行，民國25年5月），頁129-130。

〈川糖先跌後漲〉，《四川月報》，11卷3期（重慶：中國銀行，民國26年9月），頁125-126。

〈資陽糖業概況〉，《四川月報》，5卷6期（民國23年12月），頁81-83。

鄒作聖、曾翥，〈內江甘蔗引種問題〉，收於《內江市文史資料選輯》，第2、3期（總第17、18期）（1984年），頁37-41。

黃江陵，〈解放前內江的糖業貿易〉，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0輯（1992年），頁126-147。

黃江陵，〈解放前內江航運業〉，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1987年），頁129-159。

王東偉，〈解放前內江製糖業概況〉，收於《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5輯（1985年），頁186-194。

楊敏，〈建國前內江汽車運輸業的發展情況簡述〉，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1994年1月），頁100-102。

楊修武、鍾時懋，〈川康區食糖專賣概述〉，收於《內江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8年），頁95-122。

傅佑榮，〈民國時期內江縣教師的薪津待遇〉，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1994年），頁114-116。

劉建純，〈內江糖業史料瑣記〉，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1988年），頁44-58。

余農治，〈反動統治時期的內江糖業〉，收於《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1961年），頁77-91。

洪盧，〈內江市區地名謠諺選箋〉，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1輯（1993年）。

），頁132-140。

陰鈞陶供稿、范增源整理，〈內江城隍廟〉，收於《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1994年），頁201-212。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十九世紀中國的地區城市化〉，收於氏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42-300。

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收於氏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27-417。

西川正夫著、王為儒譯，〈四川保路運動前夜的社會狀況〉，收於《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25-656。